

22/1

貴陽文庫

GUI YANG WEN SHI 1996 2

貴陽文史

1996. 2



《贵阳文史》编辑部

顾问：廖海波 章德华
王萼华

编委主任：杜云峰

编委副主任：李守明

编委：尹克恂 韦廉舟
朱崇演 孙重贵
宋洪宪 何静梧
袁伯康 顾大全
张 垠 张建军

主编：李守明

副主编：朱崇演 何静梧
张建军

责任编辑：高书勤 李人选

美术编辑：杜 宁

主办单位：贵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协办单位：贵州省史学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
印刷单位：贵州三维电脑排版彩印公司
统一刊号：CN52—1104/K
出版单位：《贵阳文史》编辑部

地址：贵阳市中华中路 114 号
邮编：550001
电话：5823930
定价：5.00 元

目 录

EAB1/29

· 纪念“四·八”烈士 ·

缅怀先烈 激励后人 奋发图强

——纪念“四·八”烈士殉难 50 周年	王三运(1)
王若飞同志二、三事	谢孝思(3)
忆邓发	唐弘仁(5)
王若飞——贵州人民的骄傲	顾大全(8)
怀念黄齐生和周素园两位革命老人	周光辉(10)
万人含悲祭英灵	

——50 年前的重庆追悼“四·八”烈士大会	洪波(12)
-----------------------------	--------

·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

顺岩河急流架桥	周仁杰(15)
一份珍藏四十七年的红军文告	张建军(19)
鸭池河上(节录)	王绍南(21)
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	顾大全 朱崇演(23)
红军长征在贵阳	李守明(25)
红军两次过乌当调查报告	李 可(31)

· 文化名人谢六逸 ·

我所认识的六逸

——悼谢六逸先生	蹇先艾(36)
一柱心香祭先严	谢开志等(38)
以文会友 以友辅仁	
——谢六逸与郑振铎的交谊	沈岳如(42)
谢六逸与贵州教育	何静梧(47)

纪念编辑出版家谢六逸	何明扬(49)
谢六逸教授与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	吕幼樵 何长风(53)
忆谢六逸先生的几件事	张 垠(57)
谢六逸与我国的新闻教育	龙圻成(59)
谢六逸笔名、别名考	何明扬(61)
谢六逸著译年表	秋 阳(62)

· 文化名人姚华 ·

纪念姚华先生	廖海波(73)
博大精深的《弗堂类稿》	邓见宽(74)
艺苑奇葩	
——姚茫父先生的颖拓艺术	李 放(79)
一本别致的书	
——读姚茫父的《五言飞鸟集》	李明辉(82)
茫父先生三人谈	
——姚华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	顾汶光(84)

· 千古功臣 ·

张学良将军在开阳	赵福书(85)
忆给杨虎城将军看病	杨雁南(90)

· 黔中俊彦 ·

深切怀念我省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刘方岳先生	何 涛(92)
----------------------------	---------

· 名人留踪 ·

闻一多与清镇东山寺	石 榴(95)
吴中蕃与天河潭	张 敏(97)

· 诗 词 ·

沁园春	陆蘧山(98)
-----------	---------

缅怀先烈 激励



1996年4月6日在达德学校旧址举行纪念会会场

今天,我们在贵阳达德学校旧址纪念“四·八”烈士殉难50周年。50年前的今天,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同志和黄齐生先生,肩负革命使命,从重庆乘机返回延安时,在山西的黑茶山不幸遇难。他们为了中国的和平、团结、民主、统一事业,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用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946年,我国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家又面临内战和分裂的危险。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把中国拖向黑暗、专制的深渊,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抗争,反对内战,反对分裂,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毛泽东主席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四十三天的谈判,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赢得了主动。“四·八”烈士就是在中

国革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紧跟中国共产党,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大旗,为中华民族的翻身解放、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70多年的艰苦奋斗,不仅站了起来,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且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近,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展现了我国迈向21世纪的宏伟蓝图。市九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贵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了今后5年乃至15年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蓝图已经绘就,关键是狠抓落实。我们纪念革命先烈,就是要学习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忠心耿耿、百折不挠、英勇奋斗的精神,

后人 奋发图强

——纪念“四·八”烈士殉难 50 周年

○ 王三运

把我们的各项工作任务完成好，把制定的目标、计划落实好，加快贵阳市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步伐，以优异的成绩和崭新的风貌来缅怀革命先烈。

今天跟 50 年前相比，贵阳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作为我国西部的一个重要的内陆开放城市，目前正面临着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争抢机遇抓发展，是摆在我市各级干部和全市人民面前的一件大事，我们相信，经过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贵阳市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成果一起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中央一贯坚持的方针，全市上下务必要高度重视，把我市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各项工作一项一项的抓出实效，把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一项一项抓好落实。使我市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结出丰硕成果。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王若飞、黄齐生作为我

省、我市投身于中国革命，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革命先驱，在贵阳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大力弘扬王若飞、黄齐生的英勇事迹，教育我们的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要通过这次纪念活动，逐步把有着优秀革命传统、培养了若干当代英才的达德学校建成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1946 年 4 月 8 日殉难的 13 位烈士中，贵阳达德学校的校友就有三位：王若飞、黄齐生和革命青年音乐工作者黄晓庄，他们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这是贵阳达德学校的光荣，也是贵阳人民和贵州人民的光荣。现在，我们纪念“四·八”烈士殉难 50 周年，就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富民兴筑，振兴中华。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奋勇前进，让革命烈士毕生奋斗的伟大事业更加辉煌！

“四·八”烈士永垂不朽！

（本文系中共贵州省委常委、中共贵阳市委书记王三运同志在“四·八”烈士殉难 5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王若飞同志二、三事

○ 谢孝思

王若飞同志是贵阳达德学校(创办于1904年,为贵州历史上最早的学校)的小学生。我是1919年达德学校中学部第一期的学生。我进中学时,若飞同志已随黄齐生先生赴法国勤工俭学。当时在达中执教的包百衡先生、王慎余先生是若飞当年的同学,所以若飞应是我的师辈。

当时,校长凌秋聘常将黄齐生先生和若飞同志从欧洲的来信念给我们听,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以高材生毕业于达德中学,留校任小学部教师,黄齐生先生的儿子寿光是我班上的学生。1923年黄先生回国到达德学校,因他儿子的关系约我共餐,一夕长谈,竟结下了我与先生师弟之间20多年同甘苦、一毁誉的因缘,并进一步认识若飞同志,相亲相近至最后的诀别。

1940年,我与齐生先生又一次在因遭日机轰炸迁到乡间的达德中学相聚,齐生先生同意我应吾师吕凤子先生之招,赴四川璧山襄办国立艺专,逾年,转到吕先生主办的正则艺专。后齐生先生在达德学校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嫉视,杀之不敢,遂无耻地加以“莠民”的罪名,迫使这位磊落倔强的民主战士,带着他十三岁的孙儿晓庄离开贵阳到四川。

1941年元旦,我和爱人刘叔华从璧山来迎接先生,到重庆先生的姐姐(若飞的母亲)处。不久,应歇马场平教会乡村建设育才院之聘。任文史教授,主讲国族精神。既已三月,所入不快,我推荐先生于正则艺专校长吕凤子先生,吕先生慨然以正则最高名誉“教授”及最高薪水每月六石米聘之,黄先生欣然应聘。

璧山接近重庆,为关心抗战形势,黄先生每月都要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看望董必武及若飞同志。我是在1942年随黄齐生先生去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会见神交已久的若飞同志的。他身体健康,精神矫健,走路时两足尖向内,这是因在绥远狱中脚镣久拷所致;说着一口带乡音的普通话。一次,黄齐生先生建议我和我爱人刘叔华举办画展,若飞和陶行知先生亦积极赞成,并由陶行知先生领导的育才学校主办。在画展前言中提到这个画展乃是慰问劳动人民的,参观者不收门票,作品不出卖(当时在重庆的画展大多要多方逢迎达官富商来参观购买)。若飞同志和陶行知先生认真看了我们的画展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展后,我赠送若飞同志一幅他喜爱的画,上题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句;赠育才学校五幅花鸟山水画。黄先生以延安是我国革命抗日司令部,那里的领导干部为祖国革命抗战事业卓著勋劳,宜有以表示慰问,嘱我向校里师生每学期征集数十幅书画,交给他,其中部分他作了富有意义的题跋,然后转给若飞同志在延安分赠,作为正则师生的慰问品。三年之间以及先生第二次赴延安,迄未间断。

1944年,黄齐生先生携家二次到延安,我先送到重庆,由若飞同志亲自安排与20几位男女青年(其中一人是朱德的儿子)同车(黄先生曾有信寄我,详细述及若飞同志亲自组织这次旅行中的情况,此信已捐赠贵阳市档案馆)。

1945年8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王若飞同志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订下《双十协定》。毛主席回延安,周副主席、王若飞同志留重庆继续谈判,促进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族各界人民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在会场捣乱行凶,爱国人士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先生受伤,激起

全国人民愤慨，延安各界推举黄齐生先生为代表赴重庆慰问。

3月22日，黄先生携孙儿晓庄乘飞机到重庆，住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慰问既毕，我从壁山来迎，同住八路军办事处。3月28日，我和黄先生告知若飞同志，我们将赴壁山正则艺专吕凤子校长之约，留正则四日，其间黄先生为正则师生讲《新时代做人的标准》，总结黄先生生平律己待人的经验。4月2日，我随黄先生返重庆。4日，王若飞同志因工作极忙，不能陪我，表示抱歉，因我未曾到过延安，特请领导延安妇女工作的张小梅同志、领导教育工作的柳湜同志和作家何其芳同志深入细致地介绍延安妇女、教育和文艺工作情况。他们热情希望我到延安一行，我表示他日一定争取机会到延安观光。座上黄先生笑着替我表示：“仲谋一定会来”。当晚王若飞同志设宴招待。他的事情特别忙，到7时才偕同秦邦宪同志到座，经过介绍，大家言欢。

5日上午，王若飞写了一张条子与黄先生，中间写道：“政治协商会议准备召开，共产党在贵州方面有两个名额，我们拟定一个是

舅父，一个是仲谋（我那时的号），不知他敢于接受否？”条子请黄先生转我。我笑道：“自然遵从共产党的安排。”6日，黄先生邀约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陶行知、吕凤子、李仲公、柳湜、李稚甫诸先生在王若飞母亲处聚餐，我和王若飞侍坐黄先生左右为酌酒敬客。座上大家畅谈民主团结形势。黄先生许为生平快意之事。

7日下午，得知次日有飞机返延安，至夜报改期。我以不能久待，8日清晨，我即准备买车票回壁山，黄先生务要送我到车站，已持杖偕晓庄和我跨出办事处大门，俄而袁超俊（原达德学校学生，为周恩来同志驾车）自外来对黄先生说：“昨晚传闻错误，飞机已准备好，今天上午飞延安，我特驾车来接，请先生上车。”我们相与大笑。我与先生、晓庄握手别，先生上车，车开动，伸手笑相招，先生亲切而风趣地说：“北京见！”晓庄高声招呼：“谢先生北京见！”我们立不见车影，始到车站。孰知当日飞机竟迷路触山西黑茶山，人机俱毁，失我良师，失我良友，哀哉痛哉！



谢孝思先生与部分达德校友在王若飞同志塑像前合影



忆邓发

○
唐弘仁

唐弘仁同志在纪念会上发言

(一)

今年是“四·八”烈士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黄齐生等13人遇难50周年。50年以前，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曾在重庆访问过邓发，也曾多次在重庆市沧白堂等地亲自聆听过王若飞的讲演；他们不幸遇难以后，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悼念活动，我也曾在重庆市参加过规模盛大的追悼会，并曾写过悼念邓发同志的文章。往事悠悠，一转眼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邓发、王若飞同志的音容神态，追悼大会上许多哀伤悲痛的情节，仍然牢牢地铭刻在心中，有些还栩栩如生，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二)

从1945年到1947年前后那一段时期，四川重庆市是国民党政府陪都所在地。中共中央有一个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留驻重庆。当时，代表着不同政党，不同政治派别的报馆很多，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民主报等都天天出版发行报纸。重庆，是

当时全中国一个政治活动十分活跃的中心点。

我是在1946年3月上旬拜访邓发同志的。我当时去访问邓发，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邓发同志曾于1945年11月参加过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于1946年1月回国。我当时在重庆曾听到过邓发和王若飞等人参加革命活动的许多传闻，我很想通过他本人亲自口述，了解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的情况并核实我所听到的一些传闻。其次，当时重庆市大渡口炼钢厂和纺织厂工人因为受到残酷剥削和不合理待遇举行大罢工，我和新华日报记者曾去工厂进行采访。国民党政府曾派大批武装军警进行镇压，用机关枪扫射，屠杀工人群众，引起工厂和社会上的不满。我想拜访这位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倾听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和感想。

在我把准备好的问题提出来以后，他立即认真、坦率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我记得他谈的面很广泛，也谈得不拘形式，很随便。谈到了他在对英语不熟练的情况下，在旅途上如何克服种种困难，万里迢迢，抵达欧洲；

谈到了当时法国、英国社会一些不合理的情况，谈到了他在巴黎如何参观博物馆和他对法国文化艺术的观感。此外，还谈到了他自己手提小皮箱在英国闯中国大使馆以及同旅欧工人作报告的一些情况。

稍后，我把话题转到重庆市大渡口两个工厂罢工的情况。他对国民党统治区工厂的不合理制度，表示极为不满，并且认为，不用彻底、革命的方法是无法得到改善的。当我提到国民党政府动用军警镇压工人罢工活动时，他顿时面色突变，提高嗓门，大声进行谴责：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放射出愤怒的光芒，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采访临近结束时，他还问及我出生地区和过去工作及生活经历，接着从抽屉里取出一个苹果，一面用刀切开苹果，一面说：“没有什么招待你这位湖南老乡，招待你这位年青的记者啊！我很抱歉，只有一个苹果，我们两人分吃，各吃一半吧！我是一个粗人，文化程度很低，如果有什么讲得不妥当，务请你不要客气地指教。”

邓发同志那种豪爽、坦诚，那种朴质、亲切，平易近人的风度和人品，给我留下毕生难忘的回忆。

(三)

记不清准确的时间了，可能是4月9日下午，我到新华日报找田伯萍联系工作，刚一进门，便见到新华日报记者王诚等十多人围坐在一起，轻言细语地在议论着什么，大多数人都面有忧色，显得十分不安。我问田伯萍，出了什么事？田告诉我：4月8日从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没有如期在延安机场降落，可能出事了。现在大家都在此等待延安的讯息。我当时感到极为突然，也和大家一道，以十分焦急的心情等待消息。我同伯萍同志谈到不久以前曾去拜访过邓发，还先后多次在沧白堂聆听过王若飞同志的演讲，感受很深。我记得那一天多数人都一直等到晚上11点钟左右，但仍然没有听到任何确切的讯息，于是，大家

都带着怅惘和愁情，先先后后散去，我也回到了民主报报社。再过了两天，也就是4月11日方正式证实：飞机坠落在晋西北兴县南部黑茶山，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黄齐生等13人全部遇难。我再次见到田伯萍时，他向我提到马上要开追悼会，新华日报要出悼念特刊，希望我考虑写一篇短文，悼念“四八”烈士。我原来考虑，悼念文章中既然写怀念邓发，也写悼念王若飞，经过反复斟酌，决定只写一人，悼念邓发同志。题目叫《忘不了的一次会晤》。我记得原文写得很长，有2000字左右，但是，由于当时悼念的文章很多，而篇幅又只有半版，因此，经编辑修改为500字左右。

在重庆市青年馆举行的追悼大会，有6000多人参加。花圈、祭幛、挽联、悼念诗文在1000件以上。会场规模很大，显得十分隆重、庄严、肃穆，笼罩着极为悲痛的气氛。张澜是主祭，在会上先后致词的有孙科、周恩来、邵力子、罗隆基和王云五。周恩来以低沉的声调叙述了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烈士的生平和他们为革命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在谈到王若飞时说：“失去了他，意味着失去了一种力量，一种鼓励，失去了一个帮手。”他最后说：“烈士们为民主、和平、团结事业奔走到最后一口气，流了最后一滴血，以致粉身碎骨，死得十分惨痛。我们要把悲痛的心收起来，化为团结的力量，冲破黑暗，迎接光明，一定要使被破坏的协议得到实行，冲突得到停止，民主得到实现。”这时，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罗隆基的发言，回顾了王若飞和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扬眉生前的嘱咐与愿望，要求停止内战，反对分裂，要求彻底消灭法西斯，让祖国大地，消除黑暗，出现光明，以慰问死者烈士。罗隆基联系一些生活中的具体小事，影射国家大局，既谴责了当时的独裁政治，又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悲痛，语重心长，有血有肉，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共鸣与赞扬，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极为深刻。

追悼会会场前前后后，左右过道都挂满

了挽联、挽诗、挽文。有党、政、军负责人的；有各个民主党派，各界知名人士的；也有普通群众、工人、农民的。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看这些挽联、挽诗和悼词，印象最深的是郭沫若的《为多灾多难的人民而痛哭！》他从“哭若飞”到“哭扬眉”，连用了八个哭字，似乎每一个章节，对每一个死者的悲痛都联系了往事，联系以往彼此的友谊与交情，如哭如诉，又哭又诉，倾吐了郭老内心的哀伤与悲愤。郭老的悼词，有的地方还似短刀、匕首一样，讽刺、批判了国民党当局的罪行、暴政，把哀悼群众从哀伤引向悲愤的境界，看他的悼词的人特别多。田汉写的是旧体诗，六首七绝，情文并茂，读了令人肝肠寸断，倍加悲伤。

这次追悼大会是我在解放以前参加过的悼念活动中，规模最大、群众的悲痛最沉重，也是政治影响比较广泛的一次大会。

(四)

在我自己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在各个时期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中，曾经经历过各种不同的风浪，遭受过各种不同的困难与挫折，当遇到困难，遭受挫折时，特别是敌我斗争十分尖锐，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总是想到我国历史上许多刚正不阿，铁骨铮铮，在是非生死的关键时刻，大义凛然，坚强不屈的仁人志士；想起在党的历史上许多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崇高的理想，勇于舍生忘死，勇于献身的烈士。回忆起我在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囚禁在渣滓洞集中营时，便时常想起叶挺将军，曾多次朗诵他所写有名的“囚歌”，与同狱难友，互相鼓舞，坚持斗争。也曾多次想起王若飞和邓发，时常同同室难友讲述他们的革命事迹，讲述王若飞在西北国民党政府监狱中不屈不挠，坚持革命的故事。

“四八”烈士的革命事迹和献身精神，将永铭史册，光照千秋。我从邓发同志身上所受到的教育，也永远难在心中消失，他永远是我做人的楷模，学习的榜样。

(上接 48 页)

执教的几年，教育影响是巨大的。他给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树立了榜样，作为一代良师、教育楷模，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学生在他逝世数十年后，还珍藏着他写有批语的作文本，就证明了这点。傅启学在悼念文章中说：“六逸先生是文坛的泰斗，是青年的导师，是民众的喉舌。”（见傅启学《六逸先生的修养和品格》）这一评价我认为是恰当的。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谢六逸的影响。第一个例子，1945年8月20日，即谢六逸逝世后12天，《中央日报》（贵阳版）于第4版登出《追悼谢六逸先生特刊》。这期《特刊》由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文学会编，共刊出文章诗词5篇，全部是他的学生写的。其中文章4篇，即：王忠慈的《悼念六逸老师》、金沙的《默祷》、念君的《哭逸师》、李纪春的《悼念》；诗词篇有诗词三首，总题目是皮焕昌的《哭六逸师》。学生们从各自的经历和不同的感受，深深地怀念着谢六逸老师，令人读后，泪满衣襟。第二个例子，三天后，即1945年8月23日，《中央日报》（贵阳版）第4版又登出《追悼谢六逸先生特刊》，由治丧委员会编，刊出纪念文章5篇，即：治丧委员会的《谢六逸先生事略》、王亚民的《六逸先生的精神》、傅启学的《六逸先生的修养和品格》、齐泮林的《悼六逸先生》、张先智的《六逸先生之死》。又有《先生遗墨》（影印）、《谢六逸先生著作一览表》和《挽联摘录》，其中《挽联摘录》有师范学院全体师生的、师范学院齐泮林院长的、中央日报社工亚民社长的、师范学院李独清先生的、谢夫人鲍岐女士的。现将谢夫人鲍岐女士的挽联摘录如下，因为这幅挽联最为感人。其联云：“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励志已平生，论定盖棺，君或无愧；老亲在堂，幼子在室，临危无一语，家徒立壁，我将何如。”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写纪念文章的人各式各样，但无一不是被他的人格所感动；鲍岐女士的挽联，则向读者勾勒出一位正直而贫穷的爱国教育家形象。在贵州同一种报纸上几天之内登出两期特刊来纪念一位逝世的人，谢六逸是唯一的，可见其影响之大。

王若飞

——贵州人民的骄傲

○ 顾大全

王若飞,原名王运笙,别号继仁,1896年生于贵州安顺。青少年时期跟随他的舅父,贵州著名的爱国进步教育家黄齐生就读于达德学校,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曾参加过反袁活动。1918年,王若飞随黄齐生离开贵州,到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留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日本政府排斥中国学生,王若飞愤而归国,进行反日宣传工作。1919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

在法国,王若飞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刊,受到了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决心走苏俄工人阶级的道路,改造中国,由一个爱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渐渐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6月,王若飞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经过申请并得到中共中央承认为中国共产党员,旅欧少共也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王若飞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内部出版《共产主义研究会通讯集》,组织党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

1923年,根据党的决定,王若飞与赵世炎、陈延年等12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王若飞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于1925年3月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扩大会议之后,奉党的指示回国,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生涯。

1925年5月,为了发展统一战线,加强北方的军事运动,根据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的建议,党中央派遣王若飞到河南从事军事统战工作,王担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负责组建豫陕区党委。他除了发展工人运动外,还写了大量的文章,在《响导》和《中州评论》等

党的刊物上发表,宣传马列主义,并亲自作了《帝国主义与唯物史观》的专题讲解,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1926年初,王若飞根据党的指示,离开河南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第一任秘书长。同年7月,北伐军誓师北伐,接连攻克长沙、岳阳、武汉、南京。上海工人为了迎接北伐军入上海,从1926年底到1927年初,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王若飞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了第三次起义,负责指挥南市区的斗争。不久,他到武汉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后奉命回上海,担任新成立的中共江苏省委常委,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上海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1927年11月,王若飞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组织领导了无锡地区的农民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使土豪劣绅闻风丧胆。1928年6月,王若飞作为江苏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被选派为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之一,并在列宁学院学习。

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我国西北地区的地方党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当地没有统一的党组织。1931年,为了加强党对西北地区革命的领导,适应即将到来的严重局面,王若飞奉命回国,建立西北地区统一的党组织,领导西北的革命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王若飞到内蒙地区开展工作,计划在陕甘宁绥一带进行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21日晚,王若飞不幸在包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当时,王身上带有乌兰夫给他的工作报告和自己起草的一份工作报告,都藏在衣裤兜里,为了保卫党的机密和

革命同志的安全，他急中生智，借解衣之机，迅速将文件塞进嘴里，拼命往肚里吞。敌人发现后，用力卡住他的脖子，不让他吞下去。他憋得喘不过气来，仍坚持搏斗。乌兰夫的工作报告，纸质较好，又有8页之多，来不及咽下，被敌人从嘴里掏了出来。敌人把他带到了警察局，由包头押到归绥城（今呼和浩特）第一模范监狱。

王若飞从被捕的时候起，就作了为革命而牺牲的准备。他说：“一个共产党员从被捕以后，只有抱着必死的决心，才能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把被捕看作是对共产党员的最后考验。共产党员为党的利益牺牲一切以至生命，就是最高贵的品质。在漫长的5年零7个月的监狱生活中，他以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崇高精神，在狱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那条件恶劣的监禁生活中，王若飞以坚强的毅力和对党的无限忠诚，奋笔疾书，写下了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例如《中国农民战争》、《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第三国际史》、《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中国土地问题》、《党的建设》、《辩证法十九条》、《中国往何处去》、《关于国共两党优劣的比较》、《劝傅作义抗日书》、《中国共产党简史》、《五卅惨案的经过》、《中国民族问题》、《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和成长》、《为什么建立党支部》、《怎样做一个布尔什维克》、《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国大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红军撤出江西苏区的战略意义》、《如何组织红色游击队》等等。他还给贵州的亲友写了很多家信，字里行间闪耀着火一样的革命热情。他在给夫人李培之的信中，勉励夫人不要为他的牺牲而悲痛，要集中精力，努力完成党的事业，“在任何情况下，要坚持真理，经得起各种考验。”他在信中说：“别了，我们在红旗下相聚，又在红旗下分手。……请你伸出双手，迎接我们的胜利吧！”他在给表姐夫熊铭育的信中说：“个人生命，早置之度外”，“一息尚存，终当努力奋斗”。这些著作和家书，一篇篇从监狱传向社会，传到贵州，传到亲人手中，激励了无数的革命者为改造中国而进行斗争。

1933年，黄齐生去归绥狱中探视王若飞。为了让社会上知道王若飞被捕的真象，特地撰写了一篇题为《王若飞行述》的文章，介绍了王的生平和在狱中坚贞不屈的事迹。黄齐生还给当时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写了一封公开信，连同王若飞写的《狱中致绥远省傅主席书》共3件，一同印出来，装订成小册子，广为散发。这本题为《抗日战争策略》的小册子，有几万字，在社会各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王若飞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于1937年夏天出狱，回到延安，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以后，他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4年5月，王若飞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国共两党谈判，在重庆与国民党当局周旋年余。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毛泽东同志带领王若飞等亲赴重庆，举行国共会谈，签订了著名的国共会谈纪要。继后，王若飞又与周恩来、董必武一起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当局商谈停战问题，1946年1月，王若飞担任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同年4月8日，王若飞为了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由重庆乘飞机回延安。途中天气恶劣，飞机迷失方向，于山西兴县黑茶山触山坠毁。同机遇难的还有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黄晓庄等人。

由周恩来同志题写书名的《飞延遇难诸先生事略》中的《王若飞先生事略》结语中说：“若飞先生自幼苦学苦干，经四十余年学校、社会、工作、革命、监狱等实际生活之锻炼以及共产主义之熏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者之一。若飞先生二十余年之革命生涯，显示其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之杰出战士，并为同志、朋友、民众所拥戴。此次因公遇难，实为中国人民及中国共产党最大不幸和不可补偿的损失。”

王若飞的一生是不朽的，王若飞是贵州人民的骄傲。

○ 周光辉



黄齐生先生像

怀 念

黄齐生和周素园 两位革命老人

一

周素园、黄齐生两位革命老人都诞生于1879年，正是清政府腐败透顶、列强瓜分、国危寇深的年代。二老青年时期都受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学说的影响，接受了康梁等维新派的思想；周老从办报纸启发民智步入政坛，成为贵州光复的革命元勋之一；黄老则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以王若飞同志为代表的革命青年一代，成为著名的教育家。

在袁世凯称帝时期，周老流亡在外，仍四处活动倒袁。黄老则支持讨袁的军事活动；袁贼签署了卖国的“二十一条”，黄老大书“勿忘五月七日”，并刻石立碑以警师生。周老十余年探索，没有找到彻底救中国的道路，退隐还乡，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黄老则“东洋游罢去西洋”，在巴黎接触到马克思学说，支持党的活动。周老在红

二、六军团到毕节时，毅然接受党的委往，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任司令员，率领近千子弟兵参加红军长征。任弼时、贺龙等首长考虑周老年高，恐体力不支，派人劝说或到昆明、或到香港时，周老说“我今年快60岁了，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正是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历尽雪山、草地、断粮吃草根之苦，终于到了陕北。黄老则去绥远营救若飞同志。若飞同志出狱后，又去延安看望。两位老人都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和慰问，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毛主席称周老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尊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赞黄老是在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党外人士同情爱护党最早的一人。周老受毛主席之命回西南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周老出色的完成了任务，还介绍了以朱家骅同志为代表的革命青年奔赴延安。黄老从延安回来，四处宣



周素园先生像

传党的主张、八路军的成绩、陕北的新气象。第二次赴延安，作全家定居之计以后，受延安各界委托，到重庆慰问“较场口事件”受特务毒打的郭沫若等同志。可惜黄老返延时不幸遇难牺牲，周老则在特务监视下迎来了解放。

这两位历经清朝、民国两代的同龄的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入和共产党患难同当，生死与共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阵营，虽然各自的经历、活动范围不同，但其轨迹，却极其惊人地相似。

两位长髯老人，为贵州知识界树立了两个光辉的榜样。

二

1939年秋，黄老从昆明去重庆，路过毕节，毕节师范校方迫于进步师生的要求和黄老的威望，请黄老来校讲演。讲演是在学校大操场举行。校长简介了黄老是贵州著名的教育家，要大家静听黄老的讲演。此时黄老已60高龄，手抚飘逸的长髯，健步进上讲台。同学们热烈鼓掌欢迎这位为革命奔走了几十年的老前辈。当黄老讲到，我到延安住的招待所的服务员说，这个房子原来住的是你们贵州的一位老人家——周素

园时，“我听了以后，倍感亲切……”同学们又以热烈的掌声来祝福两位革命老人的健康、长寿。

我意识到这是黄老向叔祖父周素园传递的信息，我立即去向叔祖母说了。叔祖母说，你爷爷知道他来了，但最近身体不好，不宜会见……。我知道周老另有隐衷：他亲侄子——我幺叔祖父的独生子周成格不久前被抓去当兵，这是反动派上下串通对周老施加政治压力的又一个步骤。周老自离延安返家以来，多次受到反动当局的警告、特务分子对家里的监视从未间断，有时县党部书记长也亲自出马来“和老先生打牌”，我们也感到此时两位老人家会见也不太适宜，但又不能明说。晚上，我和弟妹们去黄老下榻的洪文芬表姐家拜望黄老。黄老谆谆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叔祖父是著名的革命老人，要好好向他老人家学习啊！”

近在咫尺的两位革命老人终于未能当面晤谈，成了他们的终身憾事。以后知黄老罹难时，叔祖父几天心绪不佳，坐立不安。我感到两位革命老人的心是相通的。

解放后，叔祖父在北京开会，中央统战部金城同志说，毛主席在40年代初曾托黄老送周老一床延安生产的毛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带到。这又是二位老人又一件终身憾事。

三

题外的话：

在表姐家的油灯下，黄老对我们亲切垂询，我说，我父亲周远志、姑父王崇素（周老长婿）都是黄老达德学校的学生时，黄老说记得早期达德学校有几个毕节学生一路打菩萨不知是谁，我说听老人说过有这件事。黄老说那时孙中山打菩萨，你父亲他们也打菩萨，当时也是很不容易的事。黄老听我说父亲在乡下教书时说：“教育英才走革命道路，好得很嘛”！可惜父亲赶来看望恩师时，黄老已经离毕去渝了。

情系我家三代人的黄老，已离我们50年了。我和解放前已懂事的弟弟光旭，都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斗争。黄老殷殷的期望，就像他那飘拂的长髯，永远鼓舞着我们一家。

万人含悲祭英灵

——50年前的重庆追悼“四八”烈士大会

○ 洪 波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由重庆乘飞机赴延安,因延安机场气候恶劣,无法降落,折返西安途中迷失方向,飞机于山西兴县黑茶山撞山坠毁。同乘这架飞机的叶挺将军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幼子叶九、女工高琼、黄齐生先生侄孙黄晓庄、十八集团军参谋李绍华、副官魏万吉、赵登俊,以及美籍驾驶员4人,一共17人全部遇难。这一事件,史称“四八”烈士事件。

“四八”烈士遇难的噩耗传来,举国震惊,万民同悲,深为国家多难之时失去这一批杰出人物而痛惜。1946年6月19日,重庆隆重举行“陪都各界追悼王秦叶邓黄诸先生大会”,并出版了追悼会特刊。这是一个缅怀英烈、寄托哀思的大会,也是一个动员群众完成先烈遗志,为促进国家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大业而奋斗的誓师大会。5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温这一段历史时,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当时人们的巨大悲痛和人民大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及期望,感受到“四八”烈士为国捐躯的事迹,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为使更多的人了解当时的情况,现根据有关资料,将这次大会的概况和特色简介如下。

1946年4月20日,《新华日报》第二版以《万人含悲吊“四八”烈士,陪都昨晨举行追悼》为题,报道了“陪都各界追悼王秦叶邓黄诸先生大会”的消息,并刊登了该报记者H的特写。该版同时还发表了大会祭文和部份挽联。在此之前,《新华日报》于4月17日刊

登了郭沫若写的《为多灾多难的人民而痛哭》的长诗和郭沫若作词,夏白作曲的挽歌《英雄们向暴风雨飞去》,以及各界人士的唁函;4月19日发表了毛泽东、朱德写的悼念文章和以“代论”形式发表的周恩来写的《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文。通过这些文章和消息,使人们对追悼大会的全貌及背景有一个深刻印象。

追悼大会于1946年4月19日上午9时至11时在重庆青年馆举行。青年馆门口街上,竖起了两座用白布蒙制的牌坊,街道两旁和墙上,悬挂着数百幅挽联和谏词。会场上陈设着一长排用鲜花翠柏围着的遇难者的遗像。19日清晨,许多工人、学生、职业青年、大学教授和教员,以及各党派各界领袖,“带着哀痛的心情,踏着沉重的步子,从郊区和市区各方面像潮水般向青年馆走来。”由于会场狭小,无数群众未能进入会场,“在场外签名后徘徊良久始去。”

参加追悼大会的,有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罗瑞卿、陈士渠、廖承志等同志;有国民党政要孙科、邵力子、吴铁诚、张群、张厉生、王宠惠、王世杰、雷震;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沈钧儒、张君勱、罗隆基、章伯钧、梁漱溟、张申府、褚辅成、郭沫若、缪嘉铭、王云五、傅斯年、陈启天、陈铭枢、谭平山、吴经熊、宁武、李德全、施复亮、李公朴、王昆仑等;有知识界知名人士翦伯赞、田汉、洪深、曹靖华、阳翰笙等。

追悼大会收到各单位、团体和个人送来的花圈、挽联、唁电、唁函千余件。

追悼大会由李公朴司仪，张澜主祭，孙科、邵力子、吴铁诚、诸辅成、沈钧儒、陈铭枢、王云五、周恩来陪祭。郭沫若读祭文后，由孙科、邵力子、罗隆基、王云五相继致词，周恩来同志报告烈士生平事迹。最后由董必武同志致答词，代表遇难同志家属及中国共产党表示最深切的感谢。

《新华日报》记者的特写，用下列小标题反映了大会实况：《挽歌唱起热泪滚流——人们都忍不住哭了》；《生为民主死为民主——郭沫若先生颤抖的声音，一会儿低沉，一会儿高亢》；《孙院长赞扬王秦》；《周恩来同志悲痛誓词——为了继续死者事业，要把悲痛的心化为团结的力量，为实现真正的民主而奋斗！》；《邵力子强调和平民主》；《罗隆基说定要光明——为争取一部民主宪法决不让步》。记者在结束语中写道：“人们带着沉痛悲伤心情走进会场，又抱着坚决的意志从会场里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已经不觉得再有流泪的必要了。眼前摆着的是死者遗留下来的艰巨事业，把悲痛化为团结的力量，去冲破黑暗迎接光明吧！”

二

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重庆举行的“四八”烈士追悼大会，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这次追悼大会的特色是：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四八”烈士写的挽联，也是这次追悼大会的主题。毛泽东同志在《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一文中写道：

“数十年来，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将加深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事业的决心！”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

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你们的遗志，继续奋斗，直到胜利，决不懈怠，决不退缩！”

在这篇180字的短文中，先后六次提出人民和人民事业。正是因为“四八”烈士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维护人民利益而牺牲，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才使人民群众十分悲痛，在重庆出现了万人含悲的悼念活动。

——维护和平民主和团结统一大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分裂阴谋，制止内战，是追悼会的目的。当时的形势是，八年抗战终于取得胜利后，我国遭受长期战争的浩劫，满目疮痍，民生凋敝，人民渴望和平、统一和建设。而国民党当局却坚持独裁专制，政治腐败，纵容贪官污吏大发劫收财，鱼肉人民，在军事上制造摩擦，进攻解放区……。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亲赴重庆进行谈判，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达成了“停战协议”，同年1月10日至31日，由国民党、共产党，其它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五项决议，接着又通过了整军方案和东北停战协定。这些协定虽然是写在纸上，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打算遵守和执行，但也反映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局面有所松动，被迫承认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谈判对手地位。“和平建国，方奠初基”，给苦难的祖国带来了一线希望。

“四八”烈士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飞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请示下一步促进和平，争取民主，推迟内战全面爆发的对策而遇难的。事件的发生虽是天灾，实为人祸。追根溯源则因为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一意孤行而造成时局紧张，王若飞等不得不返延安汇报请示。人们在悲痛之余，痛定思痛，把追悼“四八”烈士的活动，当作谴责法西斯统治的讲坛，把追悼会开成促进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誓师大会。

在追悼大会上，当罗隆基先生致词时，爆发了一次又一次雷鸣般的掌声。请看记者的